

2004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SOCIOLOGICAL MASTER DEGREE PAPERS

FROM THREE UNIVERSITIES

2004

**北大清华人大
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 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 2004 / 郑也夫,
沈原, 潘绥铭编.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11

ISBN 7-209-03556-7

I . 北... II . ①郑... ②沈... ③潘... III . 社会学
- 文集 IV .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1592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1 插页 378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5.00 元

前　　言

这本文集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同名文集的继续。

去年的文集选自 2002 和 2003 两个年头。今年的选自一年。去年的 8 篇论文是从三系大约 100 篇硕士论文中挑选出来的。今年的虽然出自一年,但因招生扩大了,仔细数了一下,是从 101 篇中选出的。其中人大 53 篇,北大 41 篇,清华 7 篇。

编委有了较大变动。我已经从人大调到北大,索性就承担起北大的工作,不必麻烦别人了。人大的工作转交给人大同仁中我最钦佩的潘绥铭先生。孙立平先生退役,由一直关心并支持这一工作的沈原先生接替。我和立平是老朋友,多年前有过一同办刊的愉快合作。立平坚持退出的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态度令他失望,他没有保持住文集质量的信心。我基本上认同这一事实。我今年大约阅读了三校的 30 余篇论文,质量都是属于上游的,多数依然差强人意。好在挑出的 8 篇似乎还可以。不能说“今年花胜去年红”,还算不逊色于去年。其实正是论文大面积的“低质”(说不上“滑坡”,因为我们不曾拥有过一个“高峰”),才使我们萌生了“立一标杆”的愿望。因此可以说,孙君不做的理由,正是我要做的理由。我们是老朋友,有诸多共识。在这事情上的做与不做,纯属性情所致。

今年挑选的程序依旧。沈原、潘绥铭和我,分别从各自系中挑选出一些:清华 3 篇,人大 6 篇,北大 5 篇。三人一同讨论,从这 14 篇中确定了最终的 8 篇。从各系中初选的程序不是民主的,而是以人格为基础的,以我们三人的性格作抵押的。最终的评选亦没有配额的原则,因为我们无意贯彻平均主义。如果说清华选入的比例高(7 篇论文中选中了 2 篇),那不是前定的配额,而是比较的结果。如果说在去年和今年的文集中,三系的比重还算平衡,也不是刻意而为。我们的工作还将继续,以后的文集会证明这一点。

去年的文集问世后,引来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称赞。美国洛杉

矶加州大学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说：“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一本好书。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它鲜有时下学界颇为流行的空话，套话，玄而又玄的废话，以及曾经在别处不知说过多少次的二手话，该书的几乎每一页都含有新的信息。”《社会学茶座》执行主编王焱先生说：“有明一代，学风空疏浮荡。大儒顾炎武对此曾痛下针砭说，古人采铜于山自铸铜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这些青年学子都能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之下，自出机杼，走扎实的‘自铸铜钱’的学术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都力图避免以往社会学理论研究过于思辨空灵和经验研究囿于实证而缺乏理论思考的缺陷，努力实现两者的相容兼顾。在我看来，这就把握住了社会学的精义。”北京大学王汉生教授说：“期待一年一册的《选编》成为精品，成为社会学成长发展的永远的一个窗口。”

这令我们欣慰：“立一标杆”的目标初步达到了，重要的是继续。老实说，在全民腐败和外物诱惑的大形势下，中国学术正处在低谷。多数学人已不做学问。但正如中国人普遍身材不高，仍有姚明出现，这是人口基数所使然。中国现在有 51 个社会学系，124 个社会工作系，至少 5000 名以上在校研究生。这个基数应当可以孕育出社会学界的“姚明”。北大、清华、人大三校位于中国高校的塔尖。我们占有了中国最出色的生源，也就负担了义不容辞的责任：推出“姚明”，将他输送给中国学术界，以他激励其后的莘莘学子。

我们自知，本书不会成为畅销书。它的适应范围是社会学同仁和爱好者，以及高校中社会学姊妹学科的师生们。本书的出版和销售正处在艰苦奋斗中。但这毕竟是第二年了。我们相信，只要能走过第三年，我们就几乎会永远做下去。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不是“愚公”，没有“感动上帝——人民大众”的福气。我们只想为本书赢得一个“小众”，造就一种小气候，促进一个小学科的渐进前行。

谢谢每一位购买本书的读者。

郑也夫

北京板井村寓所

2004 年 7 月 29 日

目 录

前 言	(1)
组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与组织结构的互动机制	刘振业(1)
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	
——四川省中部一个村庄的实证研究	申 静(64)
农村生育中的性别偏好研究	王文卿(121)
和谐与冲突	
——乡村传统婚礼仪式的考察与省思	魏爱云(167)
不对称的社会距离	
——对苏州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关系网络社会	
距离的初步的研究	张海辉(218)
民间金融合约形式的信息机制分析	张 翔(277)
伤残农民工:不能被赋权的群体	郑广怀(331)
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	郑 辉(392)

组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与 组织结构的互动机制

刘振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01 级
指导教师 邱泽奇

第一章 导 言

一、研究缘起

信息技术在组织中日益广泛的应用给组织社会学研究不断带来新的问题与意义,最重要的,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的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化组织在新的技术引入条件下是否产生了变革的可能。正如邱泽奇所指出的:“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已经成熟化的全球工厂和市场注入了一些新的变量,这些变量的影响就是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把工业化对人类社会组织的影响概括为工厂化模式的话,这些变量也是工厂化模式进入人类生活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即斯密/泰勒/法约尔瓶颈。……这些挑战也是组织理论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境和危机。简单地看,工厂化时期组织理论的基本假设包括:劳动分工,自身利益,对任务付酬,与之相关的组织边界,等级体制,归属感。当网络成为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假设。就像从作坊制到工厂化的转变一样,从工厂化到网络化的转变也将带给人类社会一个崭新的世界。如果把机械产业,电子产业看

作组织理论重组的两个新起点的话,那么,网络产业也将是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新起点”(邱泽奇,1999)。

确实,研究者们已经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简单而言,这些研究分别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宏观层面上具有浓厚的未来学色彩的研究,可以卡斯特(2001)的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试图表明的是信息技术对社会及组织形态可能的意义与影响,所使用的一些核心概念包括组织网络化、结构平面化等;一是更注重实证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可以 Orlikowski (1992, 2000) 和 Bloomfield (1992, 1995) 等的研究为代表,这些研究探讨的是信息技术被组织所建构与接受的过程、信息技术对组织的影响与意义等。在这一意义的研究上,组织研究者似乎天然就有着一种对信息、权力与控制关系、行动者能动性等因素深深的情结,他们反对对技术理性的迷恋与盲从,而时刻提醒人们要对技术背后隐含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因素给予充分关注,同时对行动者的意图保持某种警觉。

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建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信息技术系统在被引入一个传统企业组织之后,对既有组织结构的影响与互动机制问题,研究框架及理论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一种研究取向的启发,尤其是以 Orlikowski 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化思想直接成为本文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技术结构化理论借鉴了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二元论思想研究技术,这一理论提醒研究者注意技术不仅仅表现为一种“人造物”形态(如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等),更重要的是行动者在技术建构与使用过程中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是行动者建构了技术并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形成了某种结构要素。对这一结构要素,较早的观点认为,结构一旦经历具体化和制度化过程就被嵌入技术中而由技术所体现,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全脱离了人类代理人的影响并对行动者的行动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这其中行动者仍然能够通过行动或者解释赋予技术以新的意义和结构(Orlikowski, 1992)。而在最近的研究中,Orlikowski(2000)则完全走向了一种技术实践(Technology – in – practice)的视角,这一视角认为,行动者与技术互动所形成的结构要素不应该再被认为内嵌于技术中并由技术所体现,而是

这种结构实质上完全是偶生(emergent)的,它仅存在于行动者与技术的持续互动过程中,并通过行动者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赋予技术以新的意义而被不断地建构与重构。本文认同技术结构化视角对行动者及其与技术互动中形成的结构要素的强调对技术与结构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一视角也同样存在着几个问题:

其一,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即通常所理解的信息技术(如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与诸如ERP之类的信息技术系统是否等概念的问题。Orlikowski虽然是从两个层面上对技术进行界定的,但他所指称的技术“人造物”概念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技术概念,即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等能够被直接感知的事物^①。这一概念实质上只是设定了一个可讨论的“标的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Orlikowski认为对技术的分析应该从“使用”(或者说“实践”)的角度展开,也就是说,研究关注的中心不应该是“标的物”本身,而是它如何被行动者所描述、解释与使用。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概念实际上已经由一种狭隘意义转变为更为广泛的技术系统意义的层面上了。我们认为信息技术与信息技术系统两者是紧密联系但又严格区别的,尤其是在研究与组织结构关系的时候,必须首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与梳理。

其二,既然技术“人造物”仅仅是一种“标的”或可以利用的“工具”,那么结构就只能体现在行动者与技术的互动过程中,并由这种互动所建构与不断重构。但实际上,在信息技术进入组织之后,技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可使用的工具对象,行动者虽然可能会在使用过程赋予技术以新的意义与结构关系,但技术也同样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行动者的行动结构与既有的组织结构,这一问题显然为技术结构化视角所忽视。并且,Orlikowski更多强调了技术使用者(用户)的地位与角色,而忽视了具有不同利益与目标取向的其他行动者的作用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对技术的影响。

其三,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如果要研究技术与结构的关系与互

^① 这一点实际上与Barley对技术概念的界定一致(Barley,1986,1990)。

动机制,技术结构化视角则具有明显的不足,因为这一视角仅仅关注了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而忽视了技术自身的意义与影响。

本文将在技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重构一个分析视角与框架,以回答上述的问题,尤其是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互动机制问题。这项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组织更好地理解信息技术系统,以推动企业的信息化建设。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得说明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在传统的制造型企业中,信息技术系统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并进入组织中的,在此基础上探讨信息技术系统与组织结构的关系与互动机制问题。因此,研究有目的性地选择了一个制造型企业——青岛啤酒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青啤”或“青啤公司”)——进行实地研究,以详细的观察与研究信息技术系统进入的过程,从中获得研究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比较容易进入的原因之外,从研究角度看,选择青啤公司总部以及青岛事业部所属的销售公司、一厂和二厂作为研究个案,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因素的考虑:

其一,青啤是一个典型的国有大型快速消费品(啤酒及相关饮料)制造型企业,无论是从企业规模还是资金、实力等方面看,都具备了应用大型信息技术系统的条件;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以及企业从自身的战略角度考虑,青啤也迫切需要通过引入信息技术系统以提升管理能力与竞争水平。这样一种背景能够使我们更好的观察与理解信息技术系统引入后对组织战略管理与结构的影响。

其二,经过几年的市场并购,到本次调查进行时,青啤的全资或者控股生产厂已经达到了48家,分布于全国各地。但是,由于其产品种类比较单一,工艺及操作流程也比较统一,因此,公司的整体架构仍然比较清晰,即集团总部——事业部(分公司)——生产厂三层架构;同时,除销售公司外,目前青啤的ERP系统是由集团总部统一规划与实施的,因此在不同的事业部与生产厂所上的系统功能模块

基本上是一致的。通过对某一事业部或者几个生产厂的调查研究，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集团范围内系统的建设、推广与应用过程及其影响。

其三，目前青啤 ERP 系统实施最成熟也是最成功的是华南事业部。青岛事业部几个厂虽然最早就上了系统的一期，但主要限于财务模块，包括部分库存管理等模块，其他相关模块都没有实施，这使得 ERP 在青岛事业部的运行成效并不很理想。在本次调查期间，借鉴华南模式的成功经验，青啤刚刚完成了青岛事业部 ERP 二期的项目调研及前期准备工作，并准备于 2003 年年底完成二期的实施工作。这为本次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观察系统实施的过程，并进行结构变革的前后比较。

本项调查主要采用开放式的访谈方法。由于目前青啤事业部 ERP 项目一期与二期实施范围限于财务、销售以及物流（主要是库存与采购管理模块）等，因此，本次调查主要访谈对象也限于这几个领域的相关人员。访谈对象包括青啤高层管理人员、青啤信息管理总部（具体负责青啤信息化建设）相关人员、青啤销售公司相关人员以及青啤一厂和二厂的财务、生产与库存管理人员。^① 除了访谈所获资料外，本次调查也搜集了与研究相关的其他一些文献资料^②。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将主要来自访谈资料，也包括部分的文献资料。

第二章 案例介绍

一、青啤公司简介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特大型企业，其前身是国营青岛

^① 参见附录 1：个案访谈对象。

^② 参见附录 2：文献资料索引。

啤酒厂,始建于 1903 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啤酒生产企业,生产的“青岛啤酒”是国际市场上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品牌之一。1993 年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在香港和上海上市发行 H 股和 A 股股票。

青啤公司目前已在全国 17 个省市建立起自己的生产基地,现啤酒年生产能力已经超过 300 万吨,并建立和完善了遍布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其啤酒生产能力、品牌价值、产销量、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利税总额等多项指标均居国内同行业首位,成为国内生产规模和出口量最大的啤酒企业。2003 年,青啤与全球最大啤酒制造商安海斯 - 布希(即美国 AB 公司,下文将简称为 AB 公司)签定了战略性投资协议,按照协议,青岛啤酒将分三次向 AB 公司发行总金额为 1.82 亿美元(约合 14.16 亿港币)的定向可转换债券。该债券在协议所规定的七年内将全部转换成股权,AB 公司在青岛啤酒的股权比例将并最终达到 27%。

青啤目前建立了总部——事业部(子公司)——生产厂三层组织结构。^① 所属的事业部(子公司)包括青岛事业总部、青岛啤酒华南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啤酒华东控股有限公司、青岛啤酒淮海事业部、青岛啤酒鲁中事业部、青岛啤酒北方事业部、青岛啤酒东北事业部、青岛啤酒胶东事业部、青岛啤酒西南联合公司、青岛啤酒东南事业部。青岛事业总部包括青岛啤酒厂(青啤一厂)、青岛啤酒二厂、青岛啤酒四厂、青岛啤酒麦芽厂、青岛啤酒第五有限公司、青岛啤酒进出口有限公司和青啤朝日饮品有限公司。本次调查主要是在青啤集团总部与青岛事业总部所属的青啤一厂、二厂以及销售公司进行的。

二、青啤公司信息化建设的背景与目的

青啤公司努力推广以 ERP 系统为代表的信息化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企业所面临的技术、市场等环境压力与企业战略管理的需求推动的。

从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状况来看。虽然通过近几年不断地市场并

^① 关于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架构,参见附录 5。

购等活动,青啤的规模、生产能力、市场占有率等各项指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在国内同行业中位居首位,但是,中国的啤酒行业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青啤不仅有燕京啤酒、珠江啤酒、华润控股的各个啤酒品牌等几个国内较大的竞争对手,还要面对各地非常多的小品牌对市场空间的挤压,同时,百威等国际啤酒品牌也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抢占市场份额。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青啤就必须对市场做出及时而灵活的反应,以应对竞争的压力。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青啤通过几年持续的市场并购,到本次调查开始时,在全国已经有大大小小的啤酒生产厂 48 家,虽然企业规模与生产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同时,各个生产厂的情况都不相同,这也给企业的管理能力带来了更多的要求与挑战,青啤实行的事业部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尝试。此外,青啤毕竟是一家传统国有企业,虽然 1993 年就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上市,但很多管理理念、经营机制等并未能真正转变,企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传统思想、制度的影响与约束。而与青啤结成战略伙伴的美国 AB 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啤酒生产商,在全球各地拥有十几家工厂,但它的管理是高度统一的,采购、销售等全部由总部统一管理,青啤在很大程度上希望能够达到 AB 那样的管理水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啤在新的总裁上任之后,经营战略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所谓的“做大做强”转变为“做强做大”,并确立与实施了“新鲜度管理”、“高起点发展、低成本扩张”等一系列战略决策,以推动青啤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与持续经营。青啤对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推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这些问题与企业战略的一个反应:

这个是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需要。公司和 AB 公司合作,要成立国际化大公司,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你不搞这个东西,将来怎么和别人竞争?信息化要上去,才能快速地形成决策的机制。就是这么个目的。现在我们主要是在建设一些基础的东西,现在我们就是要通过信息化把一些杂乱的东西、信息通过这

样的信息收集的系统,为领导们决策提供信息,形成一个为市场服务的东西。销售啊、财务啊,要形成规范化的东西。另外一个,我们还是传统的管理模式,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管理公司,也要通过信息化,变传统的管理模式为现代的管理模式,便于公司的控制力度加强,有一个市场控制能力。(参见访谈资料 ZD01)

青啤最终选定了 Oracle ERP 系统,并聘请专业的技术咨询顾问公司辅助负责系统实施。基于企业的实际情况,青啤确立了“总体规划、领航实施、建立模板、滚动推广”系统实施策略,先在青岛本部试点,然后向华南、北京、上海、西安等几个基础较好的地方推广,再进一步向全国推广。而于 2002 年 6 月由信息管理总部牵头启动实施华南事业部领航系统,已经使华南事业部成为青啤 ERP 系统实施最完整、最有效的公司,青啤其他事业部的 ERP 系统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将以华南事业部为模板进行推广。

三、青啤信息化建设历程

* 1993 年,青啤公司成立专门小组负责组建青啤的 MIS 系统。通过艰苦努力,在半年时间内使整个系统初具规模,并于 1994 年初开始正常运转。整个系统包含生产、销售、财务、人事等模块。

* 1997 年,利用虚拟主机的方式组建青啤的网站并开通了 E-mail 服务。

* 1998 年,开通自己的 E-mail 服务及专线入网。

* 2000 年,实施 Oracle ERP。一期(财务与分销系统)在公司本部及青岛市内各厂进行财务及库存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同期,青岛事业部销售公司也开始实施 Oracle ERP 系统并投入运行。直到目前,销售公司的系统与总部推广的系统仍然相互独立。

* 2001 年初,进行财务系统二期工程——在全国范围内 40 多个企业推广财务及库存信息系统。

* 2002 年 6 月,由股份公司信息管理总部牵头,启动华南事业部领航系统。

* 2002 年 11 月 8 日,基于 Oracle 平台的青啤集团 ERP 系统得以在华南事业部的本部及 5 个试点企业(4 家工厂、1 个销售公司及其下属 1 个销售分公司)成功上线。

本次调查所涉及的青岛事业部下属的一厂和二厂使用的仍然是 2000 年一期工程实施的财务与部分库存管理模块,目前青啤正着手在青岛事业部推广 ERP 系统二期工程,二期主要包括库存、采购等业务模块,并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模块。在本次调查期间,青啤已经基本完成了二期的项目调研、解决方案及人员培训等准备工作,将于 2003 年年底正式上线运行。

第三章 文献综述

斯格特认为,组织研究开始成为社会学重要的研究范畴与领域,“也许能粗略地追溯到韦伯(1946 trans., 1947 trans.)或更小程度上米歇尔(1949 trans.)关于官僚体制分析的英译本”(斯格特,2002:8)。韦伯的科层制理想类型,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关于工业社会时期(至少是早期)的组织结构蓝图,后来的很多研究都是在这一结构框架内展开讨论的。^①而组织结构作为环境性变量(自变量)向因变量的转变,是 1950 年代中后期以来组织社会学研究视角的一个主要变化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技术与结构的关系成为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无论研究者如何对技术进行界定,广义上的生产技术在关于技术与结构的研究中无疑是技术范畴最主要的构成内容。虽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获得迅速发展并在 90 年代之后获得广泛而深刻应用的信息技术已经对传统组织及组织结构产生了新

^① 韦伯科层制理想类型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社会学早期关于组织结构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即视组织结构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并在这一结构框架内,研究组织参与者(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与观念等,以检验或者批判韦伯科层组织的理论。早期的 Merton(1952)、Blau(1955)、Gouldner(1954)、Selznick(1949)等的经典研究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一领域。也参见 Scott(1975)。

的深远影响,也逐渐成为组织社会学关注的新的重点,但是,如果要探讨的是现实的情境,是信息技术引入之后对目前组织结构或人类行为的真实影响,我们就会发现,研究者对信息技术与结构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承袭着已有的技术与结构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框架,比如信息、控制与权力、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形式化/非形式化等。因此,虽然本文要讨论的是信息技术,但是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与结构的研究仍然对本文具有相当的理论意义,我们也将对这些研究一并进行梳理。

由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多,本章将把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按照研究取向分别纳入几个主要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内进行评述,并主要关注各研究取向的核心观点及逻辑上的不足与相互联系。

一、技术权变理论

技术权变理论是技术与结构研究中一个主要的研究视角。最早注意到技术是组织结构的一个普遍决定因素的是 Woodward (Woodward, 1958; 1965) 的经验研究,以及 Thompsom 和 Bates (Thompson and Bates, 1957) 的一篇理论文章(斯格特,2002)。循着这些研究者所开拓的思路,这一理论取向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Woodward, 1958, 1965; Perrow, 1967; Blau et al., 1976; Hickson et al., 1969; Gerwin, 1981; Fry, 1982),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成为技术与结构研究的中心主题。

总体来看,这些研究都致力于形成技术与正式组织结构关系广泛意义上的一般性结论,即讨论组织结构的差异是否与技术的某种或某些维度和特征有关,并且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经验性研究。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研究在结论上的差异远比所达成的共识大得多(Reimann, 1977)。Fry (1982) 在全面检视既有的技术与结构研究的基础上,也认同了上述观点。他的分析表明,正是“关于技术和结构的概念定义、研究分析的层次(个体、群体还是组织层面)以及测量类型”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研究结论之间的差别。的确,技术研究者已经提出了大量的具体指标,用以把握技术的显著方

面,这些技术测度指标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研究结论的差异。^①斯格特在总结技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可以包括大多数具体技术标准的一般维度,即复杂性或多佯性、不确定性或不可预测性以及互倚性。他认为这三个一般维度可以识别出预测组织结构特征所需的最关键变量。(斯格特,2002)

无论技术研究者对技术概念及其维度的界定与把握如何不同,技术权变理论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研究是否验证了技术是组织结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而在于这些研究表明了技术与组织结构关系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根源,即技术自身所蕴含的不同属性或维度对组织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力。这一点正是被后来的一些理论模式所有意或无意忽略掉的。然而,通过技术的某些一般性维度来预测组织的结构特征,也具有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尤其是在分析技术与结构的互动关系与作用机制上。一方面,技术权变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理性视角的静态分析,是一种单向度决定论观点,并没有回答诸如“技术越常规化,则结构越倾向于形式化”这类关系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的问题。与之相联系的,正如 Child(1972)指出的,这一模型因此倾向于忽视(或者说无视)人的行动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与影响,行动者的行为、解释、意图等主观因素在研究中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这也就不再理解,为什么这一理论取向无法有效解释相似的技术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构这一问题。因此,要充分理解技术如何进入组织并与结构互动,就必须重视社会动力学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分析。

二、技术的社会决定论和战略选择理论

对技术权变理论的一些重要批判来自于技术的社会定型与战略

^① Fry(1982)在总结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区分出五类特别的技术指标或者说技术维度,分别是:技术复杂性(Technical Complexity)(Woodward,1965)、操作技术及操作可变性(Operations 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variability)(Pugh et al.,1969)、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Thompson,1967)、常规化/非常规化(Routine – nonroutine)(Perrow,1967; 1970)、原材料的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 of raw materials)(Mohr,1971)。其他的一些技术指标或者只是标签上的差异,或者是在综合了以上几个维度的基础上提出的。